

重写晚明史

王朝的末路

樊树志 著



中华书局



樊樹志

「重写晚明史」系列

《晚明大变局》

《新政与盛世》

《朝廷与党争》

《内忧与外患》

《王朝的末路》

ISBN 978-7-101-13917-4



9 787101 139174 >

定价：48.00元

重写晚明史

王朝的末路

樊树志 著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写晚明史.王朝的末路/樊树志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9.7
ISBN 978-7-101-13917-4

I.重… II.樊… III.中国历史-研究-晚明 IV.K248.3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14485 号

书 名	重写晚明史:王朝的末路
著 者	樊树志
书名题签	刘 涛
责任编辑	贾雪飞
装帧设计	刘 丽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920×1250 毫米 1/32 印张 12 插页 3 字数 300 千字
印 数	1-10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13917-4
定 价	48.00 元



樊树志 复旦大学教授。代表著作有：《重写晚明史：新政与盛世》(2018)、《重写晚明史：朝廷与党争》(2018)、《晚明大变局》(2015)、《明代文人的命运》(2013)、《明史讲稿》(2012)、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》(2008)、《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》(2007)、《国史十六讲》(2006)、《江南市镇：传统的变革》(2005)、《权与血：明帝国官场政治》(2004)、《晚明史(1573—1644年)》(2003)、《国史概要》(1998)、《崇祯传》(1997)、《万历传》(1993)、《明清江南市镇探微》(1990)、《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》(1988)等。其中，《晚明史(1573—1644年)》获第十四届“中国图书奖”；《晚明大变局》入选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新华网、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。

出版说明

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，共五部，是著名学者樊树志先生有关晚明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。

樊树志先生长期从事明清史、江南地区史、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，在晚明史领域卓有建树，被誉为“晚明史研究第一人”。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，细致描绘了晚明王朝从盛世到覆亡的历史长卷，尤为可贵的是，作者将晚明历史置于 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，视角独特，立意新颖，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中勾勒和展现出晚明历史的各个方面，不仅独具史识，而且叙事清晰，文笔流畅，充分呈现了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世界。

晚明，按照樊树志先生的定义，为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，即 1573 年至 1644 年间的七十一年，持续长度约占整个明朝的三分之一。本书《王朝的末路》是“重写晚明史”系列的一种，书写了大明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，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。特此说明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一九年一月

目 录

第一章	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	1
一	无解的难题：如何兼顾“安内”与“攘外”	3
	1. “剿兵难撤，敌国生心”	3
	2. 与清的议和尝试	9
	3. “以中枢之齟齬，厄而置于死地” ——卢象昇殉国	16
	4. 洪承畴、孙传庭奉旨转向“攘外”	25
二	“盐梅今暂作干城”	30
	1. 张献忠与李自成的谷城之会	31
	2. 张献忠重新起兵	37
	3. 杨嗣昌奉旨督师	43
	4. 左良玉玛瑙山大捷	48
三	“功虽未成，尽瘁堪悯”	54
	1. “平贼大将军”的纠葛	54
	2. “有斩督师献者，赍白金三钱”	58
	3. 李自成驰骋河南	63
	4. 杨嗣昌：“呕血伤心，束身俟死”	73

四	“灭寇雪耻”成泡影	80
1.	朝廷上下的反省	80
2.	辽东：速战速决铸大错	88
3.	松山、锦州兵败如山倒	94
五	“款建虏以剿寇”	100
1.	“可款则款，不妨便宜行事”	100
2.	秘密媾和	103
3.	“堂堂天朝何至讲款”	106
第二章	无可奈何花落去：明朝的覆亡	113
一	无力回天的君臣	114
1.	从张至发到薛国观 ——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	114
2.	“还是他做”：周延儒复出	124
3.	稍纵即逝的新政	129
4.	匿名揭帖“二十四气”	136
5.	姜采、熊开元之狱	141
6.	“延儒功多过寡，令免议”	152
7.	“勒令周延儒自裁”	157
二	“兵火纵横，中原涂炭”	165
1.	“君非甚暗，孤立而炀蔽恒多”	165
2.	“闯曹雄视河洛”	170
3.	“决河灌城，士民溺死数十万”	175
4.	“开了城门迎闯王”	183
5.	“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，不可轻动”	193
三	挽救命运的失败尝试：出征、南迁、勤王	199

1. “嗟尔明朝,大数已终”	199
2. 形式主义的“代帝出征”	206
3. 举棋不定的“南迁之议”	212
4. 鞭长莫及的“勤王之师”	222
四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	229
1. 倪元璐的“三做”,朱由检的“罪己”	229
2. 土崩瓦解,京师孤注	235
3. “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”	242
4. 青史凭谁定是非	249
5. 从容赴死的忠臣们	258
第三章 改朝换代,谁主沉浮	269
一 从大明到大顺到大清的政权更迭	270
1.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	
——闯王进京面面观	270
2. 朱由检的殡殓与李自成的劝进	278
3. 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	282
4. 打着“报尔君父之仇”的幌子	
——清军进取中原	289
二 南京弘光小朝廷	300
1. 南京政府的动向	300
2. “两家一家,同心杀灭逆贼,共享太平”	
——南明与清朝和谈	306
3. “清歌漏舟之中,痛饮焚屋之下”	
——南京弘光政权一瞥	313
4. 崇祯皇太子之谜	320

三 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	332
1. 左良玉发兵东下“清君侧”	332
2. 扬州十日：焚尸八十万	339
3. 南京陷落：弘光小朝廷分崩离析	347
4. “头可断，发不可剃”：江阴守城八十日	355
5. 不屈的遗民们	361
 《重写晚明史》后记	371

第一章

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皇帝采纳杨嗣昌“必安内方可攘外”的方针，集中兵力于“安内”，在一年多的时间内，剿抚并用，招抚了张献忠、罗汝才等部，几乎全歼李自成等部。在功败垂成的关键时刻，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九月，北方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边关，兵临北京城下。这与崇祯二年“己巳之变”的形势大不一样：崇祯二年，陕西的民变不过是星星之火，可以从陕西三边等地征调军队保卫北京，立即化险为夷；而崇祯十一年，民变已成燎原之势，战火蔓延中原各省，朝廷调动各省常备军之外，还把守卫北方边防的关宁铁骑调到中原战场，使得北方边防呈现空虚状态。满洲铁骑势如破竹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与此时形势不无关系。满洲铁骑南下，打乱了既定部署，朝廷最高当局放弃“必安内方可攘外”的方针，把洪承畴、孙传庭及其精锐军队，悉数从安内战场调到攘外战场。这一决策的直接后果，使得李自成、张献忠获得重整旗鼓的时机，东山再起，朝廷在“安内”方面从此丧失主动权。

“安内”与“攘外”，实在是两难选择，正如史家所言：“京陵迫于边塞，才动风尘便成大恐，而敌兵岁至，寇锋日竞，守外则失内，击内则失外，其欲款外以专内者，举朝譙呵，使不得毕其语。”^①可谓进退维谷，左右为难。

^① 戴笠、吴乔《流寇长编》卷首《自叙二》。

一 无解的难题：如何兼顾 “安内”与“攘外”

1. “剿兵难撤，敌国生心”

杨嗣昌正在集中精力实施“四正六隅”“十面张网”战略时，朝廷愈来愈感到“寇”与“虏”内外交困的压力，不得不反思“必安内方可攘外”的方针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三月初十日，杨嗣昌回应廷臣的疑虑，谈及当前内外交困的形势，把它与宋朝相比拟，重申自己的观点，主张给予北方的封疆大吏便宜从事的大权，“抚赏敌国”，“暂弭大患”，待到平息中原盗贼之后，再来“恢复祖宗疆土”。他在奏疏中着意强调对满洲战争二十年，劳民伤财，一事无成：

以臣思之，边烽发难二十年，国家用兵二十年，雄边健儿尽膏白刃，中原赤子尽化潢池，亦二十年于兹。上自官府盖藏，中而有司积贮，下至亿万生灵，一钱半菽付之逝水亦二十年。其中智者运谋，勇者效力，谁不曰灭此而朝食哉！要归其实，不过耗巨万万财，屠巨万万人而已……然己巳（崇祯二年）、丙子（崇祯九年）边烽两逼陵京，深入畿南重地，吾皇焦劳五位，筹画万方，去亲征相间几何？其仅仅俘掠饱颺，别无盘踞之志。乃我圣神之福德，国家之幸事，未可狃之以为常也。今若不顾民穷财尽，盗贼蜂起，中原南服，根本虚摇，而必以剿敌为事，今日增兵，明日措饷。耗累巨万万财不已，又以新财续旧财；屠累巨万万人不已，必以后命填前命。是即谓之孤注。

既然如此,那么计将安出呢?他给出的答案是微妙的“抚赏”二字:

眼前未见,必有驯至之时;当身不任,必有接手之祸。而为臣子且求敷衍此日,待其驯至,付之接手何人?此乃万世罪魁,狗彘不食……中国外国,决然不能相无;抚赏机权,灼然不容偏废。通此一路,俾边臣得假便宜,暂弭大患。待数年之后,敌国渐衰,而我中原盗贼止息,氓庶安生,钱粮不苦于沃焦,甲士不忧于呼癸,然后奉将天威,大彰挾伐,以恢祖宗之疆土,以偿积岁之逋诛,似乎亦未为晚。^①

杨嗣昌的意思,不妨给封疆大吏“便宜”大权,向满洲方面做些让步(他称为“抚赏”),不仅给予金钱,还可以割让一些疆土,达到“暂弭大患”之目的。由于牵涉边臣的“抚赏机权”过于宽泛,皇帝没有表态。

杨嗣昌为此继续向皇帝兜售他的“抚赏”设想:“昨边烽款宣,因建义州之说,欲权宜诱誓于辽,使我蓟(镇)宣(大)之长边不扰,陵京之重地无虞。然后撤内备以增练关门之骑兵,办轻装以张捣辽沈之声势,而我腹心之祸以边尘不耸而次第消除,根本之摇以枝叶无伤而仍还巩固。虽狗马迂愚,未能尽当圣意,而实为宗社生灵永久之计,非苟且目前已也。”^②皇帝似乎有点松口,倾向于杨嗣昌的“抚赏”设想,但是关照,务必保密。他的圣旨写道:“奏内事机,着该抚监便宜酌行,不许抄传。”^③他的意思很清楚,即使给边臣“便宜”大权,“抚赏”之事也应该悄无声息地进行,只做不说。

五月初三日,皇帝在中极殿召见大臣,要他们就安内与攘外这个棘手问题,出谋划策。他采用类似殿试的方式,提出一个问题,要大臣们当场写出对策。皇帝提问:“年来天象频仍,今年为灾甚烈,且金

① 杨嗣昌《实剖愚忠疏》,《杨文弱先生集》卷二十三。

② 杨嗣昌《覆关宁抚监密奏边情疏》,《杨文弱先生集》卷二十三。

③ 杨嗣昌《覆关宁抚监密奏边情疏》,《杨文弱先生集》卷二十三。

星昼见，已逾五旬。将谓主兵耶？今方在用兵，四月山西大雪，冻毙人畜，将谓边地耶？然时已入夏，何所致欤？朝廷腹心耳目托寄臣工，今应担当者嫌怨在念，司举劾者情贿系心，以致嚣尤易起，直枉难分，何所凭欤？钦限屡违，寇尚未灭，处分则剿局更张，再宽则功令不信。况剿兵难撤，敌国生心；边饷欠多，蠲留未已。民贫既甚，正供犹难；侵剥旁出，如火益热。至于重利尚欺，分畛去公，近多比比。即有操守清谨者，又自傲睨，遂非必也，俱令处置得宜，禁戢有法。卿等忠能体国，才足匡时，其悉心以对。”^①从天变谈到战争、吏治、民生，中心思想是八个大字：“剿兵难撤，敌国生心”，也就是说，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？

其他大臣的对策答卷写得如何，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，唯独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答卷激起了舆论的非议。向来以才思敏捷著称的杨嗣昌，当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策论，顺着皇帝的思路，从天变破题，然后引经据典，列举历史上虽有天灾却不曾引来政局动荡的事例，侃侃而谈。他援引的几则典故，带有明显的影射现实意味。比如，杨嗣昌举例说，东汉建武二十三年（47）三月，月食火星，当年无事；次年，匈奴八部大人呼韩邪单于向汉朝求和，光武帝把此事交给公卿讨论，公卿们都以为天下初定，中国空虚，夷人情伪不可知，不能答应议和。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，引汉宣帝故事^②，主张接受单于的议和请求，以利于完复边郡。光武帝采纳这一主张，终于实现与匈奴的和好。^③又比如，杨嗣昌说，唐宪宗元和七年（812）正月，月食荧惑，当年魏博镇田兴来降，李绛请求“推心抚纳，结以大恩”。唐宪宗采纳此议，派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镇宣慰，犒赏军士，柳州百姓减免一年赋役。再比如，杨嗣昌又列举一

① 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卷二十四《内阁·御试阁员》。

② 汉宣帝故事，指汉宣帝甘露元年，呼韩邪单于归汉，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。

③ 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，匈奴的南单于，袭用祖父呼韩邪单于称号，请求内附，得到光武帝允许。

个相反的事例：宋朝太平兴国三年(978)七月，月食荧惑，次年兴师讨伐北汉、出征契丹，连战连败。宰相张齐贤说：“圣人举事，动出万全，必先本后末，安内养外。”^①

杨嗣昌以古喻今，目的依然是“必安内方可攘外”，所以他说：“窃臣前因奏对援引不伦^②，只今束躬待罪，何敢复称汉唐宋之言？第缘伏读谕旨，至尊独自忧天，群臣听从其便，狗马惶汗欲死，不敢不述鄙闻，仰慰圣怀万一。”^③他谈历史目的在于为皇帝排忧解难，解决现实问题。此后几天，他陆续上疏表明态度，颇以忠心耿耿自诩：“追维十一年，以枢曹事皇上者，济济多贤。臣才力不及梁廷栋，学问不及熊明遇，练达不及张凤翼。而一点痴肠，勉担大事，嫌怨不避，罪眚不辞，窃不在诸臣之下。今从前无一毫可论，仍烦向后杞忧不止，就事论事，而又何用虚拘，以误邦政，以郁人心为也。”^④显然是在为他的“抚赏”满洲主张辩解，并非为了私利，而是不误“邦政”，才“勉担大事”，所以不避嫌怨，不辞罪眚。几天之后，他再次解释“抚赏”乃是安内攘外的必要手段：

缘臣积年思算，烽（指满洲）若狡窥，我谋制驭，惟有关宁大练战兵轻骑五万，堪以不时出塞，声张捣巢，斯彼不敢远离窟穴，越犯蓟宣。乃我平平稳稳堂堂正正之着。但欲行此着，必须撤去近畿稍缓之兵，而后可以并力关宁，又必削平中原蔓延之寇，而后可以宿储供亿。计及于此，则必假西目之市，缓边烽之来。使数年不犯，而后我之贼乃可平，兵乃可练。其时鲁市即变，边烽即来，而我不患无以待之。较之今日中原残破，赤子疮痍，禁旅边兵皇皇内调，犹恐不能尽贼者，心思孰暇

① 杨嗣昌《微臣伏读谕旨疏》，《杨文弱先生集》卷二十四。

② 指此前杨嗣昌上疏援引“春秋大一统之义，司马彰九伐之威”，皇帝以为不伦不类。

③ 杨嗣昌《微臣伏读谕旨疏》，《杨文弱先生集》卷二十四。

④ 杨嗣昌《再请臣罪疏》，《杨文弱先生集》卷二十四。

孰不暇，气力孰整孰不整，不待智者而知也。^①

杨嗣昌果然是“一点痴肠”，“嫌怨不避”，他的大胆言论一出，朝廷上下舆论哗然。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讲究夷夏之辨，注重以史为鉴，明朝君臣对于宋朝处理与辽、金的关系频频失误十分敏感，因此对清（崇祯九年〔1636年〕满洲改国号为“清”）的议和，一直讳莫如深。杨嗣昌时而用隐晦曲折的言辞，时而用直截了当的话语，宣扬对满洲议和，以实现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，这是注重夷夏之辨的官员难以接受的。工科都给事中何楷（字元子，漳州镇海卫人）、南京御史林兰友，接连予以抨击。何楷的言论最有锋芒。他在题为“敬天以实不以文”的奏疏中，指责杨嗣昌屡屡援引历史典故别有用心：“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，欲借以伸市赏之说也；引元和宣慰故事，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；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故事，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。其附会诚巧。”^②殊不知皇帝对于杨嗣昌的主张早就心领神会，驳回何楷的奏疏，批了八个大字：“枢臣不必深求，钦此。”

有恃无恐的杨嗣昌在答辩奏疏中，只字不提何楷所说的“欲与清人互市封赏”“不可对外用兵”，而在别的问题上大做文章。

一则说：“臣引建武、元和等事，皆汉唐信史，岂科臣言之则是，臣言之即非乎？”

再则说：“臣受主上恩深，忝负兵戎重寄，孤行一意，危祸多端，臣不敢避，不能避也。第以狗马愚忠，借之挑激发难，仰恃圣鉴洞明，容有未忍。”

三则说：“钦奉明旨，怜臣‘不必深求’，臣恐深求者方从此始，臣不

① 杨嗣昌《覆辽抚密奏边情疏》，《杨文弱先生集》卷二十四。

② 李逊之《崇祯朝记事》卷三，崇祯十一年五月。谈迁《国榷》卷九十六，崇祯十一年五月丁丑。张廷玉《明史》卷二百七十六《何楷传》。